

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发展

天津商业大学 赵 芃 山东师范大学 田海龙

提要：变异社会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主要分支，至 20 世纪末已在语言变项与社会变项之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提出的言说者具有“能动性”理念发展了拉波夫关于语言与社会的“相关性”认识。进入 21 世纪，变异社会语言学对言说者语言风格的研究取得新的成果，在研究对象方面进一步细化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在研究方法方面进一步提倡质性研究。本文对这些新发展进行梳理和讨论，初步归纳其特征，认为变异社会语言学在 21 世纪前 20 年的发展强调了语言变异的建构性和进行变异研究的跨学科性，同时也通过提出新的工具性概念突显了对语言变异的理论阐释。

关键词：变异社会语言学；风格实践；语言变项；社会变项；新发展特征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105(2022)01-0137-11

New Developments in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

ZHAO Pe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 Hailong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is a main branch of sociolinguistics, and by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it had already seen a development from Labov's conceptualization of "correlation" to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agency" between linguistic variables and social variables. In the first 20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advances further in that 1) it witnesses more researches that provide insightful account for speaker's stylistic practice, 2) it expands the range of research objects in terms of linguistic and social variables, and 3) it applies more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case studi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se new achievement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new development, which are tentatively summarized as 1) emphasizing the constitutive role of variation, 2) advocating a transdisciplinary effort on variation studies, and 3) highlighting theoretical account by applying various conceptual tools.

Key words: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stylistic practice; linguistic variables; social variables; features of new development

1. 引言: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创立及初步发展

变异社会语言学也称“定量社会语言学”,现在多用“变异研究”称之。它与地域方言学有密切联系,但是将研究重心从语言的地域变异转向社会变异,并把方言中的发音和词汇特征看成言说者的社会标记。变异社会语言学由 Labov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创立,典型的研究案例(如 Labov 的马萨葡萄园岛和纽约百货商场的研究)通过对某个语言变项的具体使用情况(语言变体)进行定量分析,探究这一语言变项与某个社会变项(如年龄、性别、社会阶层)之间的联系。例如,他(Labov, 1966)选取纽约市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三个百货商场,调查收集不同售货员发(r)这个音位变项的不同音位变体,对数据进行统计并推导证实语言的使用与使用者的社会阶层具有相关性(correlation)。Trudgill (1974)运用 Labov 开创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对英国东部城市诺里奇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发(ing)这一音位变项的不同音位变体进行研究,发现社会阶层越高,使用[ɪŋ]音位变体的词(例如 *singing*, *going*)频率就越高,而下工阶层几乎总是使用[in]这样的非标准音(如说 *singin'*, *goin'*),也验证了社会阶层与语言变体的相关性,与 Labov 纽约百货商场案例中的研究发现相一致。

Labov 的研究被称为变异研究的“第一次浪潮”(Eckert 2012, 2018; Wardhaugh & Fuller 2015),是社会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Bell et. al. 2016);他提出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异质性语言观,向 20 世纪 Saussure 和 Chomsky 主流语言学同质性语言观提出挑战,也被认为是对普通语言学的巨大贡献(Cornips & Gregersen 2016)。然而,变异社会语言学并非几十年一成不变。在进入 21 世纪之前,Milroy (1980) 和 Eckert (1989) 的研究就对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例如,Milroy (1980) 通过考察音位变体与社会网络成员的性别、年龄、以及所在地区的关系,发现个人的语言运用与其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等级相关,即社会网络密度越高,语言变体使用的比重就越大,而且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说话人会运用不同的语言变体来实现各自与其所处网络之间的适配。Milroy 将人的能动作用引入变异研究,认为这种密切的社会网络关系对语言变体的使用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进而加深了对个体语言变异的认识(Sharma & Dodsworth 2020)。再如,Eckert (1989) 对底特律市郊贝尔顿中学学生的语言变体进行研究,没有把学生使用语言变体的情况局限在学生的性别和社会身份这些静态的社会范畴上面,也不仅仅考察语言变体与学生父母的社会经济阶层和受教育程度之间的联系,而是侧重考察这些分属不同群体的中学生从事的日常活动以及参与活动时谈论的各种话题,进而将导致学生语言变异的原因从他/她们所处的“言语共同体”发展至“实践共同体”,发现导致学生语言变异的原因是他们感兴趣的社会活动以及对这些社会活动的社会认知。

Milroy 和 Eckert 对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被称为变异研究的“第二次浪潮”(Eckert 2012, 2018; Wardhaugh & Fuller 2015)。这次浪潮有两大特征: 1) 引入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而不仅仅是依靠定量的数理统计方法认识语言变项与社会变项之间的联系; 2) 引入了“能动性”概念, 不再像 Labov 那样将语言变异视作某种社会变项在语言使用上的客观体现, 而是将语言变异看作是言说者个体身份的一种主动表达。可见, 变异研究的第一次浪潮只是发现了语言变项与社会变项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而第二次浪潮则在探究二者之间联系所具有的因果关系方面有所进展。

2. 变异社会语言学在 21 世纪的新发展

进入 21 世纪, 变异社会语言学进一步发展, 不仅体现在新的研究成果上面, 而且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面。

2.1 新的研究成果

变异社会语言学在 21 世纪前 20 年的新成果构成变异社会语言学“第三次浪潮”的主要内容 (Wardhaugh & Fuller 2015)。根据 Eckert (2012, 2018) 的观点,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研究包括 Kiesling (1998) 对兄弟会这一群体说话方式进行的研究, Moore (2004) 对英国博尔顿中学女生说话方式进行的研究, Bucholtz & Hall (2005) 对身份实践的研究, 以及 Zhang (2005, 2008) 对中国外商独资企业经理人言谈方式的研究。这些研究案例注重探究言说者使用特定语言变体的目的, 突显出语言变体所带来的新的社会意义, 以及生成的新的社会范畴。例如, Kiesling (1998) 发现兄弟会通过高频率使用语言变体舌尖音 [-ing] 来突显他们的权力, Moore (2004) 发现高中女生越来越多地使用非标准句法 (如她们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后使用 were, “he were drunk”), 并借此形成了一个称作 “populars” 的反叛群体; Bucholtz & Hall (2005) 发现言说者在语言实践中通过风格实践 (stylistic practice) 将自己置于社会环境之中 (亦见 Bucholtz 2010)。

我们以张青的研究来具体阐释这个问题。她 (Zhang 2005, 2008) 发现,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在北京的外商独资企业里的年轻女性经理人讲话方式非常特别, 与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说话方式形成鲜明对照。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她们使用全音调 (full tone), 即当时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具有全球化特征的市场中通常使用的一种被称为“港台腔”的汉语发音方式。这种对于北京人来说完全陌生且从未出现在国有企业职工工作环境中的说话方式, 将她们的工作环境带入了跨国领域。与此同时, 她们也避免使用一些北京本地的发音方式, 如词尾的儿化音 (rhotacization) (把“花”[hua]音发为[huar])。儿化音这个语言变项是北京话中

最明显的语音特征,在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儿化音多被作家用作描绘典型的生活在北京皇城根儿下的男性人物形象“京油子”的说话方式,因此这样的发音被普遍视为是北京话独特的“油腔滑调”的语调 (Zhang 2008: 201)。Zhang (2008) 发现,虽然国有企业经理人说话时带有明显的儿化音,但是外商独资企业里年轻的女经理人却极力避免使用儿化音这一北京本地的发音方式。Zhang (2008) 指出,这种独特的说话方式 (“港台腔”和没有儿化音) 构建出她们与国有企业经理人不同的社会身份,并且表明她们和国有企业经理人这些社会范畴的说话方式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她们所在的工作场所导致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差异体现而来。

此外,21 世纪变异社会语言学的新发展还体现在方言接触研究上面。例如, Kerswill 及其团队研究了伦敦内城出现的一种与少数民族相关的新语言变体,发现这种英语口语或方言的起源与“传统”英语有很大不同,揭示了新方言产生的原因。他们 (Kerswill et al. 2013) 调查了伦敦北部内城劳工阶层 4 至 40 岁的儿童和成年人的发音情况,发现内城口音中最明显的变化在于双元音系统,认为这种新语言变体与年龄密切相关,儿童和青少年是导致新语言变体产生的主要力量,是移民后代群体二语习得的结果。这种语言变体被称为“多元文化伦敦英语”,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城市方言接触研究的经典案例,对认识新方言的特征以及代际传承的方式都具有启示意义。

2.2 新的研究对象

以上这些典型研究案例之所以能够代表变异社会语言学在 21 世纪的新发展,主要是因为它们与前两次浪潮的研究相比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方面已发生明显变化。就研究对象而言,新世纪的变异社会语言学更加注重研究言说者个体的语言变异问题,而且这种带有个体差异性的语言变异也更多的与言说者个体的情感、身份等社会范畴联系在一起分析。例如, D'Onofrio & Eckert (2021) 调查了言说者发音的一些特点,如他可能会在讲话时音调特别高或者特别低,元音的发音特别靠后,或者将爆破清辅音 /t/ 拉长或加强。这些发音特点被认为是这个言说者的音位变体,它们在听者看来表达了一定的情感。例如,发 /t/ 音时声音大并拉长表达出更为强烈的情感意义,或者说,这种发音方式与情感之间存在某种“象似性” (iconicity)。在这方面, Gal (2013) 关于语言变体所代表的感知质量 (qualia, 如轻重、干湿、直截了当) 的研究也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早期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关注说话者明显且稳定的社会阶层,并且将言说者的身份同其社会范畴的归属等同起来。与此不同,21 世纪的变异社会语言学不仅超越 Labov 关注的音位变项 (r) 这一具有地区性的、明显的、非标准的语言变项,而且超越“言语共同体”“社会网络”“实践共同

体”这些“客观存在的社会范畴”,不再笼统关注作为整体的“性别”“年龄”“阶层”这些“确定的、宏观社会经济范畴”,而是将个人说话方式与语言变异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如 D’Onofrio & Eckert (2021) 所示,“情感”这些在以前被认为属于“个体”差异的问题现在也被当作“社会”变项进行研究,而像语音语调、音高音低、重复重音这些以前被认为是“个体”言说特征的问题也被当作社会语言学变项进行研究。不仅如此,新的变异研究将语言变异作为言说者个体社会身份的体现,认为其社会类别和属性是言说者语言实践构建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更为深刻地认识了语言变项与社会变项不是“相关”的两个变项,而是集中体现在个体身份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集合体。这些新的研究首先从言说者的说话方式入手,然后找出个体说话方式的独特之处并对其作用作出理论阐释,同时,致力于探索赋予语言以社会意义的各种资源。这种研究强调个体的说话方式,说话者不再是固定方言的被动载体,而是作为可以选择说话方式的能动个体,可以不断做出自我调整,并在社会差异化过程中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这些具有个体特征的言说方式被认为是言说者的“风格实践”,是其参与社会身份建构的“施为行为”,成为变异社会语言学在 21 世纪前二十年关注的主要语言变异现象。

2.3 新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不论是第一次浪潮中采用的是“假设—收集数据—统计归纳数据—验证假设”这样一种定量分析方法,还是第二次浪潮中采用的民族志研究方法,都没有像 21 世纪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典型研究案例那样注重对语言变体进行质性分析,对其如何建构社会意义进行理论阐释。Coupland (2016: 6) 曾注意到,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正在从大规模的整体性研究向小规模 of 个案研究转变,并且在个案研究中注重应用质性研究方法。变异社会语言学亦是如此。例如,Zhang (2018) 提出一个“基于风格的社会语言学演变研究路径”,关注风格的拥有者,突显风格的动态变化特征,强调语言意识形态在风格形成中的作用,等等(刘永厚,2019)。我们(田海龙、赵芃 2021) 从相关研究案例中归纳出一个分析框架,包括以下四个具体的分析步骤。

1) 确定语言变项及其相应的语言变体。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收集一定数量的研究语料,依具体研究目的确定语言变项及其需要特别关注的语言变体。这些变项和变体可以是词汇句法层面的,也可以是音位层面的。可以采用和标准语对照的方式确立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语言变项和变体。

2) 确定与这些语言变项及其变体相关联的社会变项。这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语言变项及其变体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二是与这些语言变项和变体相关联的具体社会变项。这些社会变项可以是年龄或性别等固定的社会范畴,但更

具有研究意义的社会变项是风格。“风格”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说同样一件事情的不同方法”，而是说者通过能动地使用语言变项和变体所要体现的与众不同的社会身份特征，如新潮、时髦、网络高手，等等。因此，“风格”是指超越了语言变项或变体所具有的指向意义的意识形态意义，是一种个人身份的社会变化 (social move)。

3) 解释语言变体对言说者新的社会身份的建构机制。语言变项及其变体在这里被视作言说者主动产出的语言创新形式，这种语言创新建构出说者新的社会身份。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涉及言说者及其实践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观念，如这种语言创新是否被认可和接受，是否被模仿，以及它所建构的新身份在社会和语言景观中的地位如何，等等。探索这一动态过程需要借助一些新的概念，如“使语域化 (enregisterment)”、“呈位化 (rhematization)”、“交际界位 (stance)”、“指向秩序 (indexical order)”、“拼凑 (bricolage)”，等等。

4) 阐释风格实践的意识形态力量。在分析语言创新的“使语域化”过程和“指向秩序”的变化基础上，进一步阐释语言变项或变体作为风格创新对引发社会变化的作用。分析的内容包括对新的语言风格的认可程度、对新的语言风格和与之相对的旧的语言风格的不同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评价中心的形成及其相互斗争。这样的分析可以说明语言创新通过意识形态力量引发语言景观的变化。

3. 变异社会语言学新发展的三个特征

变异社会语言学在 21 世纪的新发展体现出三个明显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变异社会语言学在近期的发展趋势。

3.1 强调语言变异的建构性

变异社会语言学新发展体现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语言变异具有建构性。从发展的角度看，第一次浪潮的语言变异研究，将语言变异的意义与社会范畴联系起来，确定了二者之间存在“相关性”。第二次浪潮的语言变异研究，认识到语言变异的意义与社会范畴存在偶然的因果关系。在第三次浪潮的语言变异研究中，语言变异构成了一个社会符号系统，而这个符号系统可以表达一个实践共同体关切的所有社会问题。这表明语言变项与社会变项二者融为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随着变异社会语言学对社会关切的不断深入，社会变项也不断细化，如将“情感”包括进来，从而使语言变项不再是表达固定意义的共识性标记，而成为指向不同社会意义的索引符号，进而使语言变项的不同变体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被赋予了不同的指向功能，使得语言变体成为言说者构建自己身份、立场和风格的话语策略 (Kiesling 2001, 2005, 2009; Moore & Podesva 2009)。

3.2 注重变异研究的跨学科性

变异社会语言学在注重学科融合和跨学科发展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例如, Milroy 借鉴“社会网络”理论 (Mitchell 1969) 发展了 Labov 的变异研究, Eckert 借鉴“实践共同体”理论 (Lave & Wenger, 1991) 发展了 Labov “言语共同体”的概念, 提出社会实践对于语言变异的能动作用。沿着这一发展轨迹, Coupland (2001: 15-20) 在新世纪伊始曾大胆预测, 社会语言学在未来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将更多的借鉴综合性的社会理论, 在语境研究、全球性、社会身份、以及理论应用研究方面实现突破。21 世纪前 20 年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 社会学的理论被融入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之中, 如 Bourdieu (1991: 170) 关于象征性权力的研究, 为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批评的视角 (Coupland 2016: 10), 使我们认识到语言世界不仅是一个纷繁的世界, 还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 这种不平等既具有偶然和临时的特征, 也具有结构性和延续性特征, 并影响着口音、方言、语域、以及风格和叙事技巧这些语言的形式 (Blommaert 2010: 28); 另一方面, 在语言学内部, 变异社会语言学也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结合起来, 形成新的研究路径, 如与认知语言学结合形成认知社会语言学 (Kristiansen & Dirwen 2008), 与话语研究理论结合探究新媒体话语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Georgakopoulou 2014)。

3.3 对语言变异的理论阐释

进入 21 世纪, 变异社会语言学新发展最明显的特征当属注重理论创新, 即从以前注重对语言变异现象的描述归纳转向注重对其进行理论阐释, 特别是在案例研究中提出新概念和小理论。早期的变异社会语言学被认为是一种经验式的研究, 因此, 对于社会语言学是否是“理论”也曾存在争议 (祝畹瑾 2013)。目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 社会语言学理论应该在经验研究中归纳而成, 应该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 同时社会语言学理论也应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不应该是大理论, 而是源自个案研究的个别小理论。在这个意义上, 变异社会语言学理论需要基于个案研究, 基于对小规模调查研究的阐释和概括, 同时这种概括更多地涉及意义在特定的条件下怎样能够或可能产生, 而不是意义在普遍或典型的条件下如何生成 (Coupland 2016: 6)。如果说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小理论是 21 世纪变异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特征, 那么体现这种小理论的便是新概念。在这方面, 变异社会语言学家已经提出许多新概念, 如 Silverstein (2003) 提出的“指向性”、Gal & Irvine (2019) 提出的“意识形态”、Blommaert (2010) 提出的“移动性”, Agha (2005) 提出的“使语域化”, Gal (2013) 提出的“呈位化”, 等等, 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深入和详细地阐释 21 世纪新出现的语言变异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

“指向性”是近来被广泛应用在变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 Silverstein (2003) 看来,“指向性”首先表明在某个活动的初始阶段,一定人口数量的群体被突显出来,而且该群体的某种说话方式的某个显著特征引起人们注意。一旦该特征被识别并认可,人们就可以将其从所在语言环境中提取出来,并视作是这个群体的指向性标志。之后,在人们的思想中,这个明显的语言特征就指向了这个群体,一旦该语言特征出现,使用该语言特征的人就会与该特征所属的原始群体产生联系。这种联系具有归属的特性,他者可以把这个特征当成是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不论这个印象是好还是不好。同时,指向性特征还可以被用来区分群体中的成员。当这种指向行为不断被重复并且约定俗成成为新的符号系统,就可以用于进一步的意义指向性移动。这种指向性移动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语言变项的特征不断被赋予各种不同的含义,形成“指向秩序 (indexical order)”。指向秩序不是线性的,而是可以跨越时间,同时指向多个方向并衍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意义 (赵芃 2021),因此这些意义在某一个特定时刻可以构成指向区域,即 Eckert (2008) 所说的一个人们在思想上联系起来的意义集群。其中任何一个区域都可以在特定社会语境中被激活从而产生新的意义。

另一个用于阐释语言变异的概念是“意识形态”,即那些“彼此构成网络的思想 and 解释行为” (Irvine 2001; Gal & Irvine 2019: 12)。变异社会语言学家注意到,人们一般把能否正确地发一种语言中的某个特别的音与言说者是否具有这个国家的某种特质联系起来,例如,如果能够正确发法语词 *stupide* 中的 *u* 音则被认为具有法国人的特质。然而,如果某个美国人讨厌这个声音,那么发这个音的法国人就会被这个美国人认为具有不好的特质;如果某个美国人认为法国人“异类而傲慢”,那么他就会“发现”这个声音含有这种特质 (Gal & Irvine 2019: 19)。这个过程表明,作为语言符号的同一个语言变体所体现的不同特质是被“发现”的,不仅这个变体被用来指向不同的现象,而且这种特质也是被“投射”到这个现象上面。借用“意识形态”的概念阐释这个过程,可以认识到这些具体的不同特质彼此形成对立,不是语言符号本身所具有的特征,而是社会活动者在比较这些特质时将其自身具有的背景知识、兴趣和推测引入其中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概念所具有的解释力强调语言变项对社会变项的建构不是二者“彼此相像”,而是被人为赋予了“彼此相像”的特征。换言之,“意识形态”概念解释了为什么语言变体所指向的某些特质不能直接观察到却能间接觉察到。在这个意义上,变异研究引入“意识形态”概念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语言变项与社会变项的联系具有因人而异、动态变化的特征,认识导致这种偶然性的内在动因。

4. 结语

本文初步讨论了变异社会语言学在过去 20 年的新发展,表明这些新发展体现出其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化、研究方法进一步注重在个案研究中应用质的研究方法等特征,尤其是变异社会语言学更加注重为语言创新如何构建言说者的语言风格提供阐释性理据。变异社会语言学以研究语言变异的社会意义为己任,其研究成果在 21 世纪前 20 年进一步凸显语言变异所具有的社会建构性、以及进行变异研究的跨学科性。在百年不遇之大变局的新时代,这些特征将进一步延续。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Agha, A. 2005. Voice, Footing, Enregisterment.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15: 38-59.
- Bell, A., Sharma, D. & D. Britain. 2016. Labov in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4): 399-408.
- Blommaert, J. 2010.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London: Polity Press.
- Bucholtz, M. 2010. *White Kids: Language and White Youth Ident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choltz, M. & K. Hall, 2005. Identity and interaction: A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 *Discourse Studies* 74(5): 585-614.
- Cornips, K. & F. Gregersen. 2016. The impact of Labov's contribution to general linguistic theory.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4): 498-524.
- Coupland, N. 2001. Introduction: Sociolinguistic theory and social theory. In N. Coupland, S. Sarangi & C. N. Candlin (eds.). *Sociolinguistics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Longman, 1-26.
- Coupland, N. 2016. Introduction: Sociolinguistic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sociolinguistics. In N. Coupland (ed.). *Sociolinguistics: Theoretical Deb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4.
- D'Onofrio, A. & P. Eckert. 2021. Affect and iconicity in phonological variation. *Language in Society* 50(1): 29-51.
- Eckert, P. 1989. *Jocks and Burnouts: Social Categories and Identities in the High School*. New York: Teach. Coll. Press.
- Eckert, P. 2008. Variation and the indexical field.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2: 453-476.
- Eckert, P. 2012. Three waves of variation study: The emergence of meaning in the study of vari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1: 87-100.
- Eckert, P. 2018. *Meaning and Linguistic Variation: The Third Wave in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l, S. 2013. Tastes of talk: Qualia and the moral flavor of signs.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3(1/2): 31-48.

- Gal, S. & J. Irvine. 2019. *Signs of Difference: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Social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orgakopoulou, A. 2014. Girlpower or girl (in) trouble? Identities and discourses in the (new) media engagement of adolescents' school - based interaction. In J. Androutsopoulos (ed.). *Mediatiz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Change*. Berlin: De Gruyter, 217-244.
- Irvine, J. 2001. Style as distinctiveness: the culture and ideology of linguistic differentiation. In P. Eckert & J. Richard (eds.). *Stylistic Variation in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43.
- Kerswill, P., J. Cheshire, S. Fox & E. Torgersen. 2013. English as a contact language: The role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D. Schreier & M. Hundt (eds.). *English as a Contact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58-282.
- Kiesling, S. 1998. Men's identities and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The case of fraternity men.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 69-100.
- Kiesling, S. 2001. Stances of whiteness and hegemony in fraternity men's discourse.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11: 101-115.
- Kiesling, S. 2005. Variation, stance and style. *English World-Wide* 26: 1-42.
- Kiesling, S. 2009. Style as stance: Can stance be the primary explanation for patterns of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In A. Jaffe (ed.). *Stance: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1-194.
- Kristiansen, G. & R. Dirven (eds.). 2008.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Language Variation, Cultural Models, Social System*.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Labov, W.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Lave, J. & E. Wenger. 1991.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u, Yonghou (刘永厚). 2019. Stylistic variation in sociolinguistics: Approaches, research focus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2): 280-289. [2019, 语体变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路径、热点与趋势.《现代外语》第2期: 280-289.]
- Milroy, L. 1980. *Language and Social Networks*. Oxford: Blackwell.
- Mitchell, J. C. 1969. The Concept and Use of Social Networks. In J. C. Mitchell (ed).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 Analysi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entral African Tow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50.
- Moore, E. 2004. Sociolinguistic style: A multidimensional resource for shared identity cre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9: 375-396.
- Moore, E. & R. Podesva. 2009. Style, indexicality and the social meaning of tag questions. *Language in Society* 38: 447-485.

- Sharma, D. & R. Dodsworth. 2020. Language vari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Linguistics* 6: 341-361.
- Silverstein, M. 2003. Indexical order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olinguistic life.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23: 193-229.
- Tian, Hailong (田海龙) & Zhao, Peng (赵芃). 2021. *Exploring the New Development in Sociolinguistics*. Beijing: Q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21, 《社会语言学新发展研究》.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Trudgill, P. 1974.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of English in Norw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rdhaugh, R. & J. Fuller. 2015.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7th edn.). UK: Wiley Blackwell.
- Zhang, Qing (张青). 2005. A Chinese yuppie in Beijing: Phonological vari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rofessional identity. *Language in Society* 34: 431-466.
- Zhang, Qing (张青). 2008. Rhotacization and the “Beijing Smooth Operator”: The social meaning of a linguistic variable.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2: 201-222.
- Zhang, Qing (张青). 2018.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Undoing Commonness through Cosmopolitan Mandarin*. London: Routledge.
- Zhao, Peng (赵芃). 2021. From “recontextualization” to “indexical order”: New development of conceptual tool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3): 23-30. [2021, 从“再情景化”到“指向秩序”——批评话语研究概念性工具的新发展. 《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3 期: 23-30.]
- Zhu, Wanjin (祝畹瑾). 2013. *A New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收稿日期: 2021-06-08; 作者修改: 2021-08-01; 本刊修订, 2021-08-18

通讯作者: 赵 芃 <zhaopeng@tjcu.edu.cn>

300134 天津市北辰区光荣道 409 号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o P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No. 409 Guangrong Road, Beichen District, Tianjin 300134, P. R. China